

论钱玄同的语言文字改革与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

李可亭

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是提倡语言文字改革的急先锋。他不仅设计、制作过汉语拼音方案,还倡导北京音,选用、推行简体字,从文化事业方面适应并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作者:李可亭,商丘师专历史系主任,副教授,商丘 476000

钱玄同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长期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尤其对汉语语言文字的研究和改革工作贡献卓著。他是古文大家章太炎的高足,“本其师传,复运以科学方法,参以新获材料,卓然成当代大师”^①。钱玄同认为,语言文字的改革和发展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关于语言文字的改革,他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并在现代汉语的规范化、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制作和简体字的选用、推行等方面做了许多切实的奠基工作。

一、语言文字改革的必要性

钱玄同是我国近代提倡改革语言文字的急先锋。他认为,从工具上说,汉字已经落伍了;从意义上说,它附丽着陈旧的腐化的渣滓,非廓清推倒不可;从积极方面说,它是教育文化的绝大障碍,非改革不足以语前进。他说:

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的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的用国语写出。何以故?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表示活泼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汉字做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国语故。^②

可以看出,钱玄同在语言文字改革的理论上有些操之过急,他甚至把汉字的符号功能与其所表达的特定内容混为一谈了。但是,钱玄同指出了—

重要问题,那就是汉字的困境以及改革的必然趋势。

中国文字,源远流长,作为表达人们思想、社会文化的一种工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无论是文、篆字、隶书抑或甲骨文等,都存在着难认、难写、难学、难用的缺憾。而且,文字的效用,本在表现语言;文字的职责,在表达其声。由此看来,文字改革势在必行。

钱玄同从中国文字发展的趋势上进一步阐明了文字改革的必然性。他认为,中国文字发展的总趋势是由形而意,由意而音,由繁到简。他断言:“从汉字变迁史上研究,汉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绝对的可能的事。”^③众所周知,文字初发时为象形文字,后来又发展到造字标准“六书”。但细究其内容,实为重声不重形而趋向于注音。钱玄同在其《汉字革命》的长文中对此有透彻的统计和阐发,他说:

《说文》九千余字中,据王筠的《文字蒙求》所列,则——

象形字,二百六十四个;

指事字,一百二十九个;

会意字,一千二百五十四个。

除此以外,都是形声字了。象形字和指事字,都可以算作象形文字,在《说文》中只有三百九十九个,占《说文》字全体仅二十三分之一,《说文》以后的文字,形声字占了最大多数……(且)文字日见增加,经过了一千六百年光景,到亡清修《康熙字典》的时候,共有四万余字。这三百九十九个象形文字在《康熙字典》四万余字之中,不是(只)占了全体(的)一百分之一吗?^④

由此可见,象形文字在我国早已有离形就音的倾向。钱玄同的这些认识,从事实出发,说理透彻,使反对者很难置喙。

汉字的发展由形到音、由繁到简的趋势,在晚清已为有识之士所认识,并就文字改革问题进行了身体力行的探索和实践。其代表人物如沈学、卢戢章、劳乃宣、王照等,他们的主张的共同点是:“中国该有拼音文字”,并且他们都造过拼音字母——实质上是切音字。如卢戢章的“切音新字”,王照的“官话字母”,劳乃宣的“合声简字”等。其中,王照和劳乃宣的方案当时曾在一些地方得到传播。这时期文字改革者的出发点是使切音字“大众化”,着眼在普及教育上。他们一方面认为汉字难识、难记、难写,应该改革,另一方面受当时环境条件的限制,又认为汉字高深优美,应该保留,主张改革后的汉字——切音字推广到民间,让那些知识低下的人们使用,而他们本身仍然使用正统汉字。钱玄同对他们的文字改革曾有过批评,把这一时期的文字改革称为“灰色的革命”,说他们是搞“妥协”、“调和”^⑤。正因为此,晚清时期这些人文字改革的效果甚微。

二、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和制作

1913年读音统一会制订了“注音字母”,把汉字标音的“反切”变为“拼音”。这既是中国音韵文字学史上的一大变革,同时也是对晚清的“切音字”的否定。注音字母在1918年由当时的教育部正式颁布,并在小学、中学中普遍推广,对于帮助汉字和“统一国语”有过很大的贡献。

对这种采用笔画简单的汉字(有的加以修改)来标注汉字字音的音标的汉字形式,钱玄同极表赞同。1917年6月,钱玄同致信陈独秀,题为《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谈应用文改良十三事,陈独秀回信表示“样样赞成”。钱玄同应用文改良的第七条提出:“凡两等小学教科书,及通俗书报、杂志、新闻纸,均旁注‘注音字母’。”^⑥1918年8月,《新青年》5卷2号讨论“革新文学与改良文字”问题,钱玄同主张“仍用汉字,而限制字数,旁注‘注音字母’”^⑦。“仍用汉字”为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内,钱玄同一方面主张用“注音字母”,另一方面提倡尽量采用外国人名地名词原文,“或为此数十年之内暂时应用计,则非将‘东洋派之新名词’大掺特掺,掺到中国文字里来不可”^⑧。

但是,无论是“切音字”或“注音字母”,其内容只

是在注汉字的读音,并不想成为一种拼音文字。所以,在1918~1919年,钱玄同有了更高的要求,抱着世界大同的理想来改革文字,认为应该采用语根精良、文法简赅、发音平正、是人类文字而非民族文字的“世界语”(Esperanto,一称“万国新语”)。

1918年3月,钱玄同致信陈独秀,指出改汉字为拼音的种种困难,并主张废除汉字,绕过拼音,直接过渡到世界语。他说,改汉字为拼音,各方面困难之点甚多,“中国语言文字极不一致,一也;语言之音,各处固万有不同矣,即文字之音,亦复纷歧多端,二也”。“中国文字,既非拼音,又从无适当之标音符号;三十六字母,二百零六韵,闹得头昏脑胀,充其极量,不过能考证古今文字之变迁而已,于统一音读之事,全不相干”。改用拼音后,单音词太多,一义有数字,声有平上去入等,至为困难。又说,时间已到了20世纪,“新理新事新物,皆非吾族所固有”,怎么办?是自造新名词,还是老老实实写西文原字?“既改拼音,则字中不复含有古义,新名词如何造法?”科学哲学上之新名词,自然当采用西文原字,即寻常用品,如march、lamp、ink、pen之类,自亦宜用原文,“如此,则一文之中,用西字者必居十之七八,即‘拼音之汉字’不过几个介连助叹之词,及极普通之名代静状之词而已,而其效用,不过如此,似乎有些不值得吧!”^⑨

在《新青年》5卷2号举行的世界语的讨论中,钱玄同从中外两个方面论述提倡世界语的重要性,并说,“对于Esperanto,也应该用做白话文章的精神去提倡”。在完全采用世界语之前的过渡期中,钱玄同又提出:一方面用一种外国文字为国文之外助,或法文,或英文;一方面国文限制字数,行之几年代之以世界语。

但是,1920年以后,钱玄同认为废除汉字采用世界语这种理想太高,觉得“现代的中国,只能提倡国语,而改革传达国语的工具使之‘世界化’,故专心致力于‘国语罗马字’了”^⑩。

钱玄同提供罗马字拼音与他提倡白话文学几乎是同步的。1917年钱玄同加入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为会员,致力于国语运动。1919年兼做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常驻干事。自是于国语、国音、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简体字等的制作推行,悉心参划,亘二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1923年钱玄同在《国语月刊》1卷7期“汉字改革号”上发表《汉字革命》长文,把改革后的新文字定

名为“国语罗马字”。《汉字革命》代表了钱玄同汉字改革工作的全部理想和具体规划,是研究现代文字改革运动和汉语拼音字母演进历史的重要文献。在这篇文章中,论述了汉字改革的必要性和汉字改革的可能性。当时钱玄同汉字改革的中心内容就是采用“罗马字母式的字母”。“罗马字母式的字母”不同于“罗马字母”,即不直接采用26个罗马字母,而是采用“国际音标”。但到1925年12月19日,钱玄同在为嵩山致周作人信(讨论罗马字母拼音)作“跋”时(即《一个很长的狗尾巴》),又认为“国际音标复杂细密,宜于严式之审音,不宜于宽式之实用。遂自废弃其主张而赞成纯用罗马字母”^①。

1923年“国语研究会”召开第五次常务大会,钱玄同在会上提出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的议案,决议通过,钱为11人委员之一。从此,钱玄同除教书外,与黎锦熙、赵元任、汪怡等人多半时间致力于“国语罗马字”的研究和设计。到1926年,制成“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8年由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的前身中华民国大学院公布。钱玄同在写给教育当局的一封长信中说:“罗马字母,在学术上、文化上,早成为世界公用的字母……用世界公用的罗马字母,制定中国国民的读法拼法,把本国的名称写成拼音文字的形式,其事尤为必要。”^②众所周知,“国语罗马字拼音注式”即26个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法,这是把本国文字所用的符号,因利乘便地“国际化”起来,既符合文字发展的方向,又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

关于“国语罗马字”,钱玄同有几篇重要的论文,均发表在1926年《新生》周刊上,如《为什么要提倡“国语罗马字”》(1卷2期),《“国语罗马字”的字母和声调拼法条例》(1卷8期),《关于“国语罗马字”的选用及其他》(1卷8期),《历史的汉字改革论》(1卷8期)等。其中《关于“国语罗马字”的选用及其他》最为重要,论中关于声母、韵母及声调的解释明白清晰,实为人们学习“国语罗马字”的说明书,该文1935年重载于《国语周刊》第231~234期。

钱玄同对于国语罗马字的研制和推行是尽心尽力、态度坚决的。而且在研究中,要求革新思想,要求把文字革命与理想革命统一起来。1925年9月5日,钱玄同在北京“国语运动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咱们是现代的活人,应该创造现代的新思想,绝对的不应该因袭陈死人的旧思想!立国于今世,非革新思想不足以图存……所以思想革命,尤为今日当

务之急!发表新思想的最适用的工具,便是国语的文字跟拼音的文字!我认为国语的建立是文字革命跟思想革命的第一步”。在这里,钱玄同并没有对思想革命的内容作出全面的理解,但是要求文字革命和思想革命结合起来的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但是也应该指出,钱玄同在国语罗马字运动中,因其自信和脾气问题以及主张学术民主、思想自由而给他的改革工作带来某些不足。如1929年苏联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派来两位教授,在北平要求同钱玄同、黎锦熙讨论“中国罗马字拼音方式”问题。钱玄同拒而不见,并认为:外国人对于中国语文总是隔膜的,何况“主义”不同!我们的“国语罗马字”是以国家民族为前提的。这不仅失去了一次极好的互相学习、互相交流的机会,而且也反映了钱玄同仍然停留在一个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1931年,瞿秋白等在苏联制定了“拉丁化新文字”,因他们在海参崴召开的会议上通过了“反对国语统一运动”的原则,与钱玄同一贯奉行的国语运动的方针和毕生奋斗所要达到的国语运动的主要目标相矛盾,所以,钱玄同对“拉丁化新文字”表示沉默,实际上是不赞成。1934年,上海文化界讨论关于“大众语运动”问题,许多进步人士如鲁迅等都参加了讨论,讨论中牵涉到文字改革问题。钱玄同拒绝参加,他认为“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两种方案制订的原则和拼写方式都不相同,难以合作。他既不发表文章公开反对,而且对“国语罗马字”的宣传也宣告“鸣金收军”。^③“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拉丁化新文字”曾在居住苏联远东边疆的华侨中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解放区中推行试用过。钱玄同拒不讨论,表示沉默,实是令人惋惜的。但拉丁化新文字方案也有缺点,标示声调的办法“过简”——完全不标声调,所以在学术上钱玄同竭力维护“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也是有理由的。从当时情况看,“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是“改革者的两大派”,尽管二者有争执,但“同是不满于现状”(鲁迅语)。正因为如此,在新中国成立后所制定的拼音方案中,二者皆为主要依据。1958年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里说:“1926年产生了由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制订的‘国语罗马字’,1931年产生了由瞿秋白、吴玉章等制订的‘拉丁化新文字’。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是中国人自己创制的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中比较完善的两个方案。在谈到现在的拼音方案的时候,

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功劳。”^⑭

三、北京音的倡导

因为文字注音问题,与之紧密相联的便是语言统一问题。在现代汉语的规范化方面,钱玄同起着重要的作用。

1918年,吴稚晖从上海带着他亲自编写的《国音字典》稿本到北京,共有13000多字,是根据1913年教育部读音统一会全国代表和专家多数表决的字音规定的。当时在陈颂平家中邀请了钱玄同、黎锦熙、马裕藻开审查会,经过两天的讨论便修正决定了,并于1919年正式出版。《国音字典》出版后,东南方面的教育界大不以为然,认为《国音字典》不应该用多数人表决的普通字音,应该一律照北京本地人说话的字音。钱玄同当时认为不可变更原来的审查时的原则,只能逐字复审,稍加修订。这样,《国音字典》到1920年才由教育部正式公布。

由于《国音字典》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从1925年起,钱玄同与黎锦熙、王璞、赵元任、汪怡、白涤洲6人组成委员会,对《国音字典》进行逐字逐音审查。审查时,钱玄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凡字音,概以北京的普通读法为标准”,1926年,钱玄同在与黎锦熙讨论音韵问题而写的《樵歌的跋》中,进一步提出“国语国音……应以中国北京现在的知识阶级的普通的读音为主体”,同时“主张古、今、中、外、雅、俗、京、方,都在撷取之列”^⑮。而且,规定后的这些字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仍随时代及社会需要随时变迁。这一点是钱玄同思想正确和考虑周密的地方。钱玄同又说:“现在应该用天然的话语音,以补助之,增益之,使国语国音,丰富到不可限量。所以现在定用北京语北京音作国语国音的基本,这是我们的主张。”^⑯

1929年,经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常务委员会决议,改《国音字典》为《国音常用字汇》,共12220字。由钱玄同作最后审查,1931年定稿。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出版并由教育部公布,代替《国音字典》。《字汇》中有一长篇例言,题为《本书的说明》,是钱玄同亲自写的,是一篇精细、简明、切实的作品。

《国音常用字汇》的编制历时7年,是钱玄同和他的几位朋友呕心沥血的结晶。这部《字汇》完全改用北京本地人说话的字音为标准,其中钱玄同起着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国音常用字汇》的颁布和采

用,不仅使我国汉语走向了规范化,而且又不失为今天普通话的先导。钱玄同这种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胆识和卓见,实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四、简体字的选用和推行

关于语言文字的改革,钱玄同认为:推行“国语罗马字”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的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治本是根本的改革,但非短时间所能成功,需要百年以上,所以当前最急切的办法是治标。1922年,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年会上,提出了一个《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这是一篇内容充实、论述痛快的提案文章,联署人有陆基、黎锦熙、杨树达,获大会通过。文中提出减省汉字笔画采旧五类,造新三类,所列举之字多为今天采用,如声、体、刘、为、东、范、姜、厉、盍,等等,并且说:

这种简体字,应该从学校里用起,因为学生写字底时候很多,他们需要简体字很急底缘故。国民学校的学生,从进学校起,就认这种新字,无须再认旧字,那大一点的学生,已经认过好多旧字的,可以就他原来“习字”科底时间,改为认新字和练习写新字。^⑰

1934年钱玄同拒绝参加讨论“拉丁化新文字”,同时宣告对“国语罗马字”也“鸣金收军”,努力于急切有效的治标工作。1933年“大众语”争论初发时,附带着有一种“手头字”运动,1934年上海出版界居然铸造了几百个“手头字”印在当时的杂志上。钱玄同对“手头字”运动是赞成的,但认为绝对不能用“手头字”这个名词,而应称为“简体字”。当时钱玄同正在病中,但仍发愤搜集。1935年,教育部委托钱玄同起草“简体字谱”。6月,钱玄同的《第一批简体字表》起草告成,计2300多字,送到教育部讨论,通过了1230字,最后由部长圈定了324字,于8月21日公布。这是解放前由政府公布的《第一批简体字表》。在《论简体字致黎(锦熙)、汪(怡)书》中,钱玄同提出了选用“简体字之原则”,他说:“所采之材料,草书最多,俗体次之(少数几个俗体字,已应有尽有),行书又次之,古字最少。”又说:“所集之体,字字有来历(偏旁无一字无来历,配合之字或间有未见如此写者,然亦必一见可识,决无奇诡之配合)。”^⑱

全国解放后,简体字运动从群众自动推行发展为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和设计。在钱氏简体字的基础上,1956年产生了较为完备的《汉字简化方案》。广大人民群众长期以来迫切要求简化汉

字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如前所述,钱玄同语言文字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不但有完整的计划和远大的设想,而且有高尚的旨趣和坚强的决心。他曾说:“我们的词典中没有‘屈服’、‘投降’、‘妥协’、‘调和’这些词儿。”^⑩正因为如此,在语言文字的改革上取得了巨大成绩,而且这些改革举措在文化事业上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

钱玄同是在深受封建思想文化毒害中觉悟得较早、较为彻底的知识分子,很多言论令人激奋,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和影响。他要求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用全新的思想、方法、工具教育青年和后代的做法,指导了他终生的学术活动。钱玄同语言文字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是符合中国语言文

字发展方向的,他也因此而受到后人的称赞和怀念,他的学生徐世荣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

是以精深的学术研究指导国语运动的实际工作,而国语运动的每项实际工作又都体现着他的学术见解,研究成果。试看现在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哪一项不是钱师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早着“先鞭”了。说他是“滥觞”也好,说他是“草创”也好,说他是“前驱”也好,反正现在如果上溯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的历史渊源,总不能遗忘这位树起“汉语规范化”和“汉字拼音化”的里程丰碑的闯将!^⑪

我们认为,徐先生的这个评价是中肯而有见地的。

注 释:

①⑩⑫⑬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见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附录》,齐鲁书社1986年8月版。

②③④⑤⑯钱玄同:《汉字革命》,《国语月刊》1卷7期。

⑥钱玄同:《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新青年》3卷5号。

⑦《新青年》5卷2号。

⑧钱玄同:《新文学与今韵问题》,《新青年》4卷1号。

⑨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致陈独秀》,《新青年》4卷4号。

⑪《语丝》第59期。

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

⑮《语丝》第102期。

⑯殷尘:《钱玄同先生的学术思想》,《图书月刊》1946年第3期。

⑰钱玄同等:《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新青年》7卷3号;《国语月刊》第7期。

⑱《国语月刊》第204、205期。

⑳徐世荣:《钱玄同年谱·序一》,齐鲁书社1986年8月版。

[责任编辑 李明山]